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竹林七贤学术档案

刘怀荣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竹林七贤学术档案

刘怀荣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竹林七贤学术档案/刘怀荣主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12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ISBN 978-7-307-12328-1

I. 竹… II. 刘… III. 竹林七贤—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2635 号



责任编辑:李 琼 许欢欢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whu.edu.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9.25 字数: 432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2328-1 定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20 世纪以来的竹林七贤研究（代序）

刘怀荣 石飞飞

20 世纪以来，竹林七贤研究大致经历了起步、缓慢发展、多元推进、快速发展四个时期。前两个时期的研究多围绕阮籍、嵇康展开，论题相对单一；后两个时期，研究方法日渐多样，研究视野和领域大为拓展。不仅成果数量明显增加，相关专题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而且研究质量也有显著提高。虽然还有明显的不足，但无论著作还是论文，都不乏创新特征鲜明的力作。梳理这一学术发展史，总结得失，明辨方向，对竹林七贤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在此拟从纵、横两条线索入手，对百年来的竹林七贤研究史做一初步的梳理、总结。

一

从纵向发展来看，20 世纪以来竹林七贤研究的成果颇为可观，据我们的统计，共有著作 115 部，论文 1630 篇。由于受外在环境及学者自身认识的影响，各个阶段的研究情况又有较大的不同。总体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起步期（1917—1948 年）、缓慢发展期（1949—1979 年）、多元化推进期（1980—1999 年）、快速发展期（2000—2011 年）。

1. 起步期（1917—1948 年）

19 世纪末以来，新学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竹林七贤的研究也不例外。1917—1948 年，研究阮籍、嵇康的相关

著作有8部，论文有28篇，代表性论著有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出由关注作家生平行事向关注他们与政治、文化等要素的关系，以及由传统的简要评点向细致、深入的探究转型的特点。

1917年，刘师培在北京大学国文门讲授文学史时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他在讲义中指出：“魏代自太和以迄正始，文士辈出。其文约分两派：一派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总采骋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盛于竹林诸贤。溯其远源，则阮禹、陈琳已开其始。惟阮、陈不善持论，孔、王虽善持论，而不能藻以玄思，故世之论魏、晋文学者，昧厥远源之所出。”刘师培认为，嵇、阮的文都“艳逸壮丽”，“嵇文近汉孔融，析理绵密，阮所不逮；阮文近汉祢衡，托体高健，嵇所不及”；嵇、阮诗“则为体迥异，大抵嵇诗清峻，而阮诗高浑。彦和所谓遥深，即阮诗之旨言，非谓阮诗之体也”。^①

1927年，鲁迅在广州发表演讲指出：阮籍“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② 鲁迅此次演讲是揭发国民党“四一二”屠杀的残暴，赞扬阮籍、嵇康的反抗精神，体现了学术可以为政治服务的特点，同时，此文还对竹林七贤与酒等文化的关系作了初步探索。1928年出版的胡适《白话文学史》也论及阮籍：“五言诗体起于汉代的无名诗人，经过建安时代许多人的提

① 刘师培著，刘跃进讲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39、51页。

②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载《鲁迅全集》第3卷《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98~505页。

倡,到了阮籍方才正式成立。阮籍是第一个用全力做五言诗的人;诗的体裁到他方才正式成立,诗的范围到他方才扩充到无所不包的地位。”^①

1931年,陆侃如、冯阮君在合作出版的《中国诗史》中指出,阮籍82首《咏怀诗》以“无常”为中心思想。^②1941年出版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则将竹林七贤与建安七子相比较,并指出《咏怀诗》其一的“忧思伤心”是阮籍咏怀诗的中心意境。^③刘大杰基本上采取了文学、史学、哲学互证的研究方法,且能从文学的总体发展视角审视阮籍其人其作。

这一阶段是竹林七贤研究近代化的起步期,从刘师培到鲁迅,再到刘大杰,从对阮籍、嵇康诗文作简明、精到的概述到探讨阮籍、嵇康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再到对《咏怀诗》作重点论述,初步体现了竹林七贤研究的学术发展特点。其他如徐绍烈《阮籍的思想及其作品》^④、容肇祖《述阮籍嵇康的思想》^⑤、刘荣杰《竹林七贤任诞行为与其分道扬镳之探讨》^⑥等论文也出现较早,但深度略嫌不够。

2. 缓慢发展期 (1949—1979 年)

这一时期有总论竹林七贤的专著1部,论文6篇;研究阮籍的著作4部,研究嵇康的著作3部,研究阮籍、嵇康的论文各10篇左右,除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⑦和戴明扬《嵇康集校注》^⑧外,研究

① 胡适:《白话文学史》,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72页。

② 陆侃如、冯阮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

③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90~192页。

④ 徐绍烈:《阮籍的思想及其作品》,载《学灯》1923年10月19日。

⑤ 容肇祖:《述阮籍嵇康的思想》,载《语言历史所周刊》1928年第5期。

⑥ 刘荣杰:《竹林七贤任诞行为与其分道扬镳之探讨》,载《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学报》1929年第1期。

⑦ 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⑧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的重点转向阮籍、嵇康与政治的关系，同时，出现了一批从文学、考古、音乐、养生等角度切入的成果，但因受政治大气候的影响，成果数量较少，也少有力作。

林庚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简史》中指出：“屈原所主张的‘举贤授能’的民主政治，在建安时代的基础上，就初步的被争取到。更具体的例子，如嵇康临刑时有三千太学生请愿营救他，并且要求以他为师，这就是民主的力量……名士的被害，也就是封建社会中民主成分的被摧残，正始时期因此就成为文坛的低沉时期，当时除了阮籍，整个时代几乎是沉默的。”^①由北京大学1955级学生编著、出版于1959年的《中国文学史》指出：“（阮籍）曾有过积极的志向，只因现实政治太黑暗，太恐怖，才变得放荡起来。他的放荡是一种消极遁世，腐朽纵欲的行径，但在不同流合污一点上，又有与现实对抗的意义。”^②同年，出现了两篇探讨阮籍、嵇康与政治关系的代表性论文，霍松林《论嵇康》认为，嵇康在行动上反抗黑暗的现实极为激烈，但在作品中却流露了远祸全身、消极退隐的情绪，这“是他的尖锐的思想矛盾的具体表现”，“他的反抗和被杀害，充分表明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他的不肯同流合污、坚决反抗到底的高尚品质”。^③这与北京大学版《中国文学史》对嵇康的评价不同。高海夫《略谈阮籍及其〈咏怀诗〉》评价了阮籍的“阶级弱点”，认为：“阮籍没有能把他的视线从统治阶级或者说上流社会那个狭小的圈子里解脱出来，转向广大的人民大众，反映他们的生活与痛苦、希冀与要求，这就大大地限制了他的诗歌的现实意义的广阔与深刻性。”^④此外，如罗贤《如何评介嵇康》（《文汇报》1959年3月28日）认为嵇康“始终是统治阶级的异己分子”、是“统治阶级的叛逆子孙”，圣贵、姚国华《也谈如何评价嵇康》（《文汇报》1959年4月17

①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174～175页。

②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1～143页。

③ 霍松林：《论嵇康》，载《人文杂志》1959年第3期。

④ 高海夫：《略谈阮籍及其〈咏怀诗〉》，载《人文杂志》1959年第2期。

日)、何世华《试论嵇康》(《人文杂志》1959年第3期)、何启民《竹林七贤与魏晋政局》(《教育与文化》1974年7—12月)等都是将阮籍、嵇康的研究与政治相联系,显示出学术受政治影响的痕迹。

1961年,陈直发表《对于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砖刻竹林七贤图的管见》(《文物》第10期),这是借助考古新发现研究竹林七贤的较早尝试;1963年吉联抗发表《音乐家嵇康》(《人民音乐》第12期)、1965年乔象钟发表《宣扬封建士大夫思想的小说——〈广陵散〉》(《文学评论》第1期)都考察了嵇康的音乐思想;1973年刘秉果《嵇康的〈养生论〉》(《体育文史》第3期)探讨了嵇康的养生思想,这些成果表现出竹林七贤研究领域的拓展。其他如日本学者松本幸《阮籍的生涯和咏怀诗》(木耳社1977年版)、法国学者侯思孟《诗歌与政治:阮籍的生平与创作》(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等专著,郭维森《嵇康思想及其诗文的特色》(《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陈赓平《阮籍咏怀诗探解》(《兰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陆钊珑《关于竹林之游的时间》(《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等论文,都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推进。

总的来看,这一阶段国内学者的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围绕政治立论的成果较多,二是关注阮籍、嵇康较多,对竹林七贤中的其他作家鲜有涉及。因此,研究范围相对较窄,论题也比较单一。

3. 多元化推进期 (1980—1999 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与历史、哲学、政治、宗教、民俗的多向关系,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竹林七贤的研究也进入了多元化推进时期,通论竹林七贤的著作11部,研究论文44篇;阮籍研究著作23部,研究论文121篇;嵇康研究著作20部,研究论文165篇;山涛研究论文10篇;向秀研究论文12篇;刘伶研究论文6篇;王戎研究论文3篇;阮咸研究论文5篇,与20世纪前70年相比,在研究数量及质量上都非常可观。这一阶段,竹林七贤研究由传统的简单评论成功转向以文本的细致解读为主;关于阮籍、嵇康玄学思想的研究开始出现专论;阮籍、嵇康诗歌与美学的关联也得到重

视；同时，也出现了阮籍与嵇康心态、接受史、宗教观研究的论著，这些是竹林七贤研究得到多元化推进的重要标志。

1980年出版的邱镇京《阮籍咏怀诗研究》将阮籍的咏怀诗分为“自述诗”、“讽刺诗”、“伤感诗”、“忧生诗”、“隐逸诗”，认为阮籍咏怀诗在内容方面的特征表现在“文多隐避”与“悲郁凄怆”。邱镇京还探讨了《咏怀诗》艺术方面的优缺点。^① 分析细致深入，值得重视。

1987年，余敦康撰文指出：“阮籍、嵇康玄学思想的共同特征，表现为在原来的精神支柱崩溃以后承受了巨大的内心痛苦继续从事新的探索。从他们原来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相结合的思想来看，基本上和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是相一致的。但是他们后来所从事的新的探索……代表了玄学思潮的一次重大的自我深化。”^② 这是较早的从玄学角度探讨阮籍、嵇康思想的研究成果。

王钟陵在出版于1988年的《中国中古诗歌史》中认为，嵇康诗风清峻互融，以“峻”为核心，主要体现在“他对世俗荣华的指责”及对“委心自然、服食游仙的追求”，前者“表现为‘切’与‘直’的批评性”，后者“则表现出‘清’的脱俗性”，而“绝俗人格之抒写，使嵇康诗形成了高峻清脱的特殊风格”。^③ 此论体现出作者从审美心理、美学等多角度研究文学史的特点，是重建科学文学史观的新尝试。1993年出版的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一改考索《咏怀诗》各篇寓意及本事的传统研究方式，开始探讨《咏怀诗》的美学特征、整体结构，指出：《咏怀诗》“宏大的视野及由此产生的意境，形成组诗雄浑壮美的风格，显示出笔参造化、学究天人的气象”。^④

① 邱镇京：《阮籍咏怀诗研究》，文津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222页。

② 余敦康：《阮籍、嵇康玄学思想的演变》，载《文史哲》1987年第3期。

③ 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313页。

④ 钱志熙：《魏晋诗歌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153页。

1991 年, 罗宗强撰文指出, 嵇康“以己为高洁, 以世俗为污浊的心态”, 主要表现在其厌恶仕途和“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的人生悲剧, 其实也是玄学理论的悲剧”, “还纠结着当时士人与政权的关系的种种复杂因素”。^① 罗宗强从心态和玄学角度对嵇康所做的解读, “标志着我们古典文学研究走向成熟”。^② 徐公持于 1998 年撰文探讨了两晋“嵇康情结”的发展和演变, 文章指出, 西晋时, 皇权正盛, 但“嵇康情结”的存在不容置疑, 只是较为谨慎, 尤其不敢谈及嵇康之死。东晋时期, “嵇康情结”有增无减, 表现为涉及人数的增多和情绪力度的加大。^③ 这是嵇康接受史研究的成功尝试。1999 年, 高华平撰文指出, “嵇康确是魏晋时期的一名虔诚的道教信徒”, “阮籍所信奉或倾向的宗教, 并非当时的本土道教, 而是新兴的天竺佛教”。^④ 他还以酒为研究媒介, 探讨了嵇康与道教、阮籍与佛教的关系。

此外, 20 世纪 80 年代, 何启民《中国历代思想家——嵇康》(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年版), 日本汉学会报《中国文化》第 42、43 期与《日本中国学会报》第 38、39 期分别刊登了沼口胜先探讨阮籍《东平》、《首阳》、《猕猴》的文章, 他还对《咏怀诗》的修辞方法及其与《诗经》的关系作了一定分析。90 年代, 森田浩一《徘徊与逍遥——阮籍咏怀诗的一点考察》(《中国文学报》1990 年第 41 期) 等都是研究竹林七贤的佳作。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 从 1980 年到 1999 年, 竹林七贤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和突破, 文、史、哲相结合的研究特点愈加明显, 从玄学、美学、宗教、文人心态、接受史等多角度切入的探索, 使研

① 罗宗强:《嵇康的心态及其人生悲剧》, 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 年第 2 期。

② 傅璇琮:《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序》, 载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8 页。

③ 徐公持:《理极滞其必宣——论两晋人士的嵇康情结》, 载《文学遗产》1998 年第 4 期。

④ 高华平:《阮籍、嵇康与酒及道释宗教之关系》, 载《江汉论坛》1999 年第 10 期。

究成果内容更为丰富,标志着竹林七贤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期。

4. 快速发展期 (2000—2011 年)

21 世纪以来,有通论竹林七贤的著作 21 部,论文 138 篇;阮籍研究著作 11 部,论文 359 篇;嵇康研究著作 15 部,论文 405 篇;山涛研究论文 29 篇;向秀研究论文 39 篇;刘伶研究论文 21 篇;王戎研究论文 26 篇;阮咸研究论文 4 篇。竹林七贤研究的全面推进是这一阶段研究最显著的特点;对以往较有争议的问题的深入挖掘、思考,使竹林七贤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相关学术活动的开展,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活跃。这些从不同侧面显示出竹林七贤研究的兴盛。

2009 年,曾春海《嵇康的精神世界》出版,^①该书共九章约 17 万字,涉及嵇康的生平事略、时代环境、生命才情、论辩方法、诗文特色,及其自然观、人性观、生死观、养生论、宅卜吉凶说、声无哀乐论、政治社会思想等多个层面的问题,并附有嵇康年表、嵇康研究论著目录,资料翔实准确,论述清晰流畅,对嵇康的评价非常中肯,是一部多层次综合研究嵇康的著作。2011 年,卫绍生发表《竹林七贤: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②一文,分别从竹林七贤“称谓的由来”、“缘何聚于山阳”、“人生态度”、“处事方式”、“文学创作”、“艺术风采”六方面展开论述,对以往的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这一时期,对于诸如阮籍的政治态度、《咏怀诗》是否为组诗、《为郑冲劝晋王笺》写作时间等有争议的问题,做了更深入的讨论。2003 年,孙明君出版《汉魏文学与政治》,书中对以往阮籍“心系曹魏痛恨司马氏”、“依附或歌颂司马氏”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阮籍既不是对司马氏集团深恶痛绝而对曹魏‘忠爱缠绵’的忠臣义士,也不是出卖曹魏而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小人,他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关

① 曾春海:《嵇康的精神世界》,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光明日报》2011 年 9 月 19 日。

系是特殊时期政权与名士之间的特殊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对阮籍而言是被利用被强迫的,从而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合作关系。”^① 2008 年,钱志熙针对《咏怀诗》是否为组诗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指出:“其原本写作形式,就带有系列的组诗的性质。”“阮籍的咏怀诗的主题与内容,呈现着一种逻辑展开的层次。联系着这一逻辑层次的,正是阮籍自身的思想上的逻辑层次;更进一步说,这是正始时期的一些现实问题与思想文化在阮诗上的投影的结果。”^② 他还明确指出《咏怀诗》“其一”为序诗。^③ 对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创作时间,早在 1935 年刘汝霖就提出了景元二年(261 年)八月说。^④ 针对这一观点,顾农于 2000 年提出当在甘露三年(258 年)五月说,^⑤ 孙明君认为应在甘露五年(260 年)四月,^⑥ 李晓敏认为应在景元元年(260 年)六月。^⑦ 此外,家浚、王德坝就《广陵散》是否为嵇康的作品展开争论;^⑧《鲁迅研究月刊》刊登过思庵《〈嵇康集〉跋中的一处标点错误》和司岩《〈嵇康集〉跋中的一处标点不错》两篇论文,对《嵇康集》中的标点问题进行了探讨。^⑨ 这些争

① 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59~160 页。

② 钱志熙:《论阮籍〈咏怀诗〉——组诗创作性质及其主题的逻辑展开》,载《东方丛刊》2008 年第 1 期。

③ 钱志熙:《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3 页。

④ 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47 页。

⑤ 顾农:《关于阮籍生平的两个问题》,载《天津师大学报》2000 年第 6 期。

⑥ 孙明君:《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作年》,载《文史哲》2002 年第 1 期。

⑦ 李晓敏:《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写作时间考辨》,载《文艺评论》2011 年第 4 期。

⑧ 家浚:《〈广陵散〉果系嵇康所作吗》,载《贵州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王德坝:《十八拍〈广陵散〉确系嵇康所作——答家浚同志》,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2 年第 6 期。

⑨ 思庵:《〈嵇康集〉跋中的一处标点错误》,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 年第 7 期;司岩:《〈嵇康集〉跋中的一处标点不错》,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 年第 12 期。

论，大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新思考，对于推进学术研究是有益的。

自2006年以来，中国云台山竹林七贤学术研讨会，以每两年一届的周期，已连续召开了四届学术会议。其中，首届“中国修武云台山竹林七贤学术研讨会”由河南省修武县委、县政府主办，《寻根》杂志社、《中州学刊》杂志社协办，于2006年10月在云台山举行；第二届“中国修武云台山竹林七贤学术研讨会”，由中共修武县委、县政府和《寻根》杂志社、《中州学刊》杂志社联合举办，于2008年10月在河南修武举行；“中国云台山第三届竹林七贤文化研讨会”，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和焦作市政府主办、修武县政府承办，于2010年11月在河南省修武县举行；“中国云台山第四届竹林七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焦作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与修武县人民政府承办，于2012年11月在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举行。四届会议主办单位的不断升级，也反映了竹林七贤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地方政府的重视。

总的来看，竹林七贤研究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研究方法由传统的评点、考据和校勘，到重视文学与哲学、史学、社会政治等之间的关系，再到重视文本细读和诗文内部特征研究，^①已相当成熟。其间，日本、法国等国家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学术研究与中国大陆学术研究，学术论著与学术会议，学术争鸣与媒体宣传遥相呼应，共同促成了竹林七贤研究的兴盛局面。

二

百年来，竹林七贤的研究成果集中于文献研究、文学研究、其他专题研究、比较研究四个方面，对这四个方面进行回顾和梳理，有助

^① 也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竹林七贤的作品，如董育宁：《阮籍诗用韵考》，载《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余红光：《阮籍诗用韵考辨》，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于我们从横向把握竹林七贤研究的重点和特点。

1. 文献研究

百年来,学者们在竹林七贤诗文集的校注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竹林七贤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4 年,鲁迅辑校的《嵇康集》^①,以明代吴宽的丛书堂钞本为底本,力存原钞,除了将《嵇康集》原文进行细致谨慎的校勘外,还对版本源流以及逸文进行了考辨,此后,多种《嵇康集》注本都以鲁迅所校《嵇康集》为基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竹林七贤诗文集的校注成绩突出。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1957 年和 1962 年分别出版了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②和戴明扬《嵇康集校注》^③,黄著将阮籍的 82 首五言《咏怀诗》和 13 首四言《咏怀诗》集中起来进行了详细的笺注,尤其是对阮籍 13 首四言《咏怀诗》的校注具有纠正学界偏颇的重要学术价值。戴著以明黄省曾嘉靖乙酉年仿宋刻本为底本,目次与鲁迅所校《嵇康集》基本相同,但时有纠正,是《嵇康集》校注的集大成著作。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传统校注学的成果又有新突破。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于 1987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分为上、下两卷,首次对阮籍诗文作了全面的校勘和注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迄今为止最好的《阮籍集》校注本。90 年代,李景华、韩格平等学者对此书曾提出过商榷和补正^④,这对阮籍集的校注工作起到了完善作用。韩格平《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1997 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仅辑录作品全面,校注翔实,而且眉目清晰,是科普类与学术

① 鲁迅:《嵇康集校》,载《鲁迅全集》第 9 卷,上海光华书店 1938 年版。

② 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③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④ 李景华:《〈阮籍集校注〉失误评议》,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2 年第 6 期;韩格平:《〈阮籍集校注〉补正》,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 年第 1 期。

研究类著作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也是第一部对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进行全面校注的著作。

2. 文学研究

百年来竹林七贤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咏怀诗》、《思旧赋》、《幽愤诗》、《大人先生传》等篇目的解读上。

阮籍 82 首《咏怀诗》的研究出现了一大批论文，在拓宽研究视野的同时，深度上亦有所增加。学界逐渐将视角集中于《咏怀诗》的“生命意识”及艺术特色的研究。

阮籍《咏怀诗》的生命意识研究。钱志熙指出：在阮籍 82 首《咏怀诗》中，“诗人以充分自觉化的生命置身于恶化的现实中……比之于前代诗人，阮籍对生命的伤感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自觉地继承了用诗歌抒发生命情绪的传统。《咏怀诗》82 首仍然是生命境界的诗，而且比起建安诗人，阮籍把诗的主题更纯粹地凝聚在生命问题上”。^① 尚学锋指出：“阮籍的游仙诗充满了难以超越现实生命的苦闷情绪……以审美观照的方式表现对于理想生命境界的体验。”^② 王许林进一步探讨了“《咏怀诗》生命意识的几种表现形式和运动轨迹”，指出其生命意识表现在：“对时间意识易逝的敏感和忧患”、“抒发人的生命需要遭到压抑、摧残而产生的生命孤独感”、“追求从精神上解脱生的困扰和死的恐惧，实现生命的超越，达到永恒的慰藉”。^③

阮籍《咏怀诗》的艺术特色研究。学界对《咏怀诗》风格、叙述方式、结构、语法等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徐公持指出：“《咏怀诗》在表现风格方面亦任情适性，体现自然精神。而于作者气质高洁清朗，诗歌境界超凡拔俗，加之有玄理虚胜气氛渲染衬托，故自

① 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2 ~ 263 页。

② 尚学锋：《道家思想与汉魏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4 页。

③ 王许林：《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论阮籍〈咏怀诗〉的生命意识》，载《社会科学战线》1989 年第 4 期。

然之外,又形成飘逸诗风。”^①刘上江指出阮籍《咏怀诗》采取了“对受挫心理体验的否定思维”、“对死亡体验的隐晦诉说”、“对孤独体验的虚化”的诗学叙说方式。^②尚学锋探讨了《咏怀诗》“由思考人生困境到寻求自由超脱,回归精神故园”的情感结构及“富于玄学色彩的抒情模式”。^③赵沛霖认为《咏怀诗》的线索为:出世思想的萌生、形成、发展和正式确立,并以第二十四首、五十五首为界,将《咏怀诗》划分为三个阶段,至第三个阶段,“诗人已经从出世远游中找到了‘快乐’”。李海燕从语法及篇章结构方面分析了其五言《咏怀诗》的张力。^④程怡具体探讨了《咏怀诗》“其三”的用典。^⑤王建国、秦丙坤、王尧美等则探讨了《咏怀诗》中的女性、飞鸟、路、剑等意象。^⑥邱镇京认为阮籍《咏怀诗》艺术技巧优点为“结构紧凑”、“善于发端”、“比兴特佳”、“文法的技巧”,缺点为“类似格言的缺点”、“隐晦的缺点”、“重复的缺点”、“合掌的缺点”,并指出,阮籍《咏怀诗》在形式方面“叠字频见”、“对偶自然”、“句法变化”。^⑦

邓小军从《思旧赋》以李斯与嵇康相提并论的寓意、是否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艺术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三方面做了

①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② 刘上江:《苦闷的象征——论阮籍〈咏怀诗〉的心理体验及叙说方式》,载《齐鲁学刊》2005年第3期。

③ 尚学锋:《阮籍〈咏怀〉的生命关怀和抒情模式》,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④ 李海燕:《阮籍五言〈咏怀诗〉张力的语法及篇章结构分析》,载《理论学刊》2004年第6期。

⑤ 程怡:《〈咏怀诗·其三〉的曲折用典与阮籍的心志》,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⑥ 王建国:《从阮籍的身世个性看其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象》,载《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秦丙坤:《阮籍〈咏怀诗〉中的飞鸟意象和三重世界》,载《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王尧美:《阮籍〈咏怀诗〉中的“路”》,载《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王尧美:《阮籍〈咏怀诗〉中的“剑”》,载《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⑦ 邱镇京:《阮籍咏怀诗研究》,文津出版社1980年版,第194~222页。

较为充分的论证。^① 日本学者甲斐胜二认为：“《思旧赋》里有向秀矛盾的心理，一面批评嵇康不善处世，一面对旧友的故居感到良心上的不安。”^② 学界对《大人先生传》的原型分析有三种观点：徐公持认为“大人先生”是孙登^③；韩传达则认为大人先生的原型是苏门先生^④；王晓毅认为：“真正的原型是《庄子》中住在藐姑射山的神人，以及《淮南子》等黄老派著作中关于神人、至人、真人的传说。”^⑤

随着中国文学研究体系的不断完善，对文学作品进行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对作品的纯文学解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环节。由上面的论述可知，竹林七贤文学研究主要的成果集中在对阮籍《咏怀诗》内容、艺术特色的分析，同时，竹林七贤其他作品也得到了深入研究。

3. 其他专题研究

百年来，竹林七贤与文化、美学、哲学、养生学、考古学等专题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并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体现了竹林七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文化研究。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指出：“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⑥ 刘康德《“竹林七贤”之有无与中古文化精神》从“竹林七贤之有”、“竹林七贤之无”出发，探讨了“中古时期的文化精神”，具体分析了“文化本体：研几”、“文化心态：负阴”、

① 邓小军：《向秀〈思旧赋〉考论》，载《文学前沿》2002年第1期。

② [日] 甲斐胜二：《向秀〈思旧赋〉试释》，载《文史哲》1990年第5期。

③ 徐公持：《阮籍与嵇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④ 韩传达：《阮籍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⑤ 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03页。

⑥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载《鲁迅全集》第3卷《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98~505页。